

专访“待用公益”倡议人、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 陈里:找到释放爱的方式

■ 本报记者 艾己晴

网络时代,各路红人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于各种新兴媒体之上。在这些红人之中,拥有上千万“粉丝”的陈里是个十分特殊的角色。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,是老百姓眼中的“大官”,却敢于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公布网络,接受群众的监督,聆听网络上的各种声音;他的职位是陕西公安厅副厅长,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人,身为管理学博士、硕导、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的他,非常乐意于和公众探讨中国转型中的任何社会问题,尤其是关于民生、三农、社会管理创新的难题。

陈里常说他是个农家的孩子,深刻地明白民间的苦,他说:“现在的中国有8亿农民,3亿农民工,他们不曾拥有充沛的资源,城镇化的进程使他们其中的有些人来到城市,却不能获得有尊严的帮助,这部分人不幸福,有何中国梦可言?”

2013年4月12日晚11时,陈里连续在新浪发出三条微博,呼吁国内快餐店为残疾人、老年贫困者和流动儿童提供一些“待餐盒饭”。这三声“疾呼”很快被台湾人高文麒看到,并在第二天就在自己西安的快餐店里实施了起来。随后,陈里的“待用公益”模式得到更多的企业和民众的响应,目前,有来自15个省的25个城市都已经成为了“待用公益”的实施城市。

陈里对公益事业有着让常人难以想象的热忱,带着“富而有爱,贫而有助,传递爱心”的主旨,陈里在信息的世界里掀起一波浪潮,试图让公益更贴近中国现状、更接地气、更有效率。

本期公益第一访谈,《公益时报》记者对话陈里,探讨陈氏“待用公益”在中国的现状和明天。

《公益时报》:目前中国公益事业的模式愈加多样,你选择以“待用模式”做公益的目的是什么?

陈里:我长期研究三农、社会管理问题,知道农民犯罪的原因是什么。这里不仅仅有贫穷的原因,还有这个社会并未给他们基本的尊重。选择“待用公益”,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唤醒沉淀在人们心中太久的爱心,让需要帮助的人们接受有尊严的救助,“待用公益”就是这样一种公益模式。

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民并不缺乏浓郁的爱心,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释放爱心的渠道。你知道,爱心憋得太久是会生病的,人会生病,大家庭也一样,社会倚靠合理有效的爱心释放途径来保持良性运转,富起来的人和贫穷的人在这个理念驱使下找到手拉手、心连心的平台,这也是教育孩子的好方式。

《公益时报》:我们知道在国外有一种“待用咖啡”模式,那么以你的理解,我们中国的“待用公益”文化跟国外的有什么不同?

陈里:“待用咖啡”是指在咖啡馆消费的人提前多买一两杯“寄存”在店里,一旦有囊中羞涩的贫困者询问店家是否有“待用咖啡”时,侍者就可以让其享用此前人们已付过钱的“待用咖啡”。然而,在中国,咖啡并非老百姓的必需品,那些在街头流浪为生的人能够喝上一杯白水,吃上几个包子,似乎比喝上咖啡更重要、更贴近真实的社会需求,因此,待用模式在中国的“本土化”就显得势在必行。“待用快餐”、“待用学费”、“待用抚贍”,是“待用公益”未来发展非常重



要的几部分。

而待用电影票、待用旅游门票、待用饮料、待用爱心书包、待用随行车位等都是“待用公益”的体现。我认为所谓待用公益,这是一份有尊严的等待,并让这份等待有所实用。待用公益应成为一种模式,而非聚焦某种特定商品。你看以往许多超市准备许多雨伞,使用者拿走一去不复返。而现在90%的公共卫生间和大饭店,尴尬得连卫生纸都没有,这些都是中国待用公益应该捕捉的点。

其次我认为,中国式“待用公益”必须是个特别尊重人尊严的公益模式,这个是“铁律”。就现实而言,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,待用公益在我国的实际操作过程中,的确会遇到一些难题,譬如说街头流浪者和低收入者

或许因为警戒心而拒绝你的好意。但我想,这些问题都只是暂时的,形成规模,打开知名度后,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我们也可以想一些现实的方法,比如说可以给这些街头流浪者一些领取凭证,直接到餐厅领取,避免尴尬,施助人在购买“待用物品”的时候,不要和救助者见面,不要产生直接接触,还可以在餐厅另设房间。这些都可以规避“待用公益”施行中可能遇见的尴尬。

《公益时报》:每一种新生事物,在发展之初,几乎都会受到不理解甚至打击,“待用公益”同样不能逃脱这样的宿命,那么面对这些质疑,你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?

陈里:我们现在的社会,说的人往往理直气壮,做的时候往

往不见其人。我希望在公益事业上,大家少指责、多参与。因为社会上需要做的事越来越多,行动永远胜于话语。其实,根据我的实际经验,我有“两个没想到”。一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愿意捐,现在的人买一斤韭菜都讨价还价,但是老百姓愿意把十块、二十块放在素不相识的老板那里,愿意把这碗饭送给素不相识的人吃。在今天诚信缺失、信仰缺失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奉献,这说明老百姓的爱心水平是很高的。第二个没想到,本来很多人以为会有很多人去冒领待用餐,但是两个月过去了,没发生一起这样的不该吃的人吃了的这种状况,这说明,大家把弱势群体的道德水平估计得太低了。很多事情,需要做了之后再“骂”,不能有一种恶意推测的“惯性”。我认为,即便不想捐,有爱心的人看到不愿意去政府救助站的流浪汉,主动停下脚步善意地告知他们待用快餐的具体地址也是一种功德。如果把“骂”的时间用在这儿,那么待用公益事业又推动了一大步。

《公益时报》:你获得了2012年度人民网十大个人微博第一名,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,你觉得通过微博这种新媒体真的就能把“待用公益”这么大的一个盘子运转起来吗?

陈里:2012年10月2日,陕西华山当晚突发游客滞留情况,我用微博直播成功帮助了游客进行疏散;12月10日,我又用两小时在在微博上挽救了一对西安的轻生母子。我觉得正是有了微博这种现代媒体,人们的声音,尤其是底层的声音才可以更直接有效地被表达出来。就拿“待用快餐”来说,这个公益活动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问题,公众都可以在新浪微博“@待用快餐”和待用快餐的公益网站上进行投诉曝光。现在因为新媒体,官民可以有很多的沟通,媒体和公益人也能形成很好的联动,现在已经有了数十家媒体跟进“待用公益”的报道,而且我还发现许多省份和城市的共青团官方微博在响应推动,很多公益组织在支持响应。以这种合势做公益的感觉非常好!

我期待更多的地方政府、民政部门、共青团、妇联、老龄委响应支持,让他们与公益组织联手推动,这和党的政策是一致的。党和政府做宏观上的指导和保障,民间微观参与实施。

《公益时报》:说一个很真实的窘境,现在是一个诚信危机的时代,怎样在这种环境下,保证店铺将爱心商品真实发放到有需要的人手中?又如何规避“吃

白食”、“霸王餐”等违背公益愿景的不良现象?

陈里:商家把生意看得像生命一样,我相信他们会认真对待。可以讲究“事不过三”原则,把奉献爱心人士姓名及已领取数、剩余数公布在店门外,顾客可以随时监督。诚信是灵魂,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,市场呼唤商家的诚信,与此同时,我也希望能有一个正规、统一的制度。比如说,我们可以征集爱心贴或其他标记,设置一个“待用快餐”的统一标记,经过审查,我们会授权给店铺爱心“待用快餐”标识。

而我们救助的对象,残疾人、流浪儿童、低保的老弱病残、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工,还有因特殊原因经济窘困的人,如果有相关证件最好,但是证件并不能涵盖所有的需要帮助的人,所以如果没有证件也没有关系。而且,这些待帮助的人一般外相特征比较明显,从外在样貌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,当然,外在体面的人也可能遭遇丢钱包这种窘境,那么给他一份待用餐也无不可厚非。

如果有人的身份实在不好甄别,商家可以为待用快餐设定领取上限,对重复领用的人的身份进行一定的核实,确保这项公益活动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对那些有劳动能力、蹭吃蹭喝的人进行必要的限制。我始终认为,人的自尊心还是有的,如果有人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为了图小利而不停撒谎,那么他的心理一定有问题。但我相信“待用公益”模式会感动他,最终使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

人物档案

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,管理学博士、硕导,西北大学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、西安工程大学兼职教授,陕西省党校客座教授,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,主要关注民生、三农、社会管理创新等话题。2012年5月30日,陈里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,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,表示“希望大家多支持监督”。2012年10月2日,面对陕西华山在当夜突发游客滞留情况,陈里彻夜不眠,微博直播游客疏散。2012年12月10日,陈里微博上演生死接力,2小时挽救西安轻生母子。这一年,陈里获人民网十大个人微博第一名,当选中华儿女年度人物。在发起“待用公益”模式之前,陈里还曾建议为农民工做十件实事。